



《南京1949》
李伶伶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不仅中国大陆，即使在海外，也往往会就重大时间节点，组织有关活动，出版有关图书，召开有关集会，发布有关宣言，营造某种氛围，但时间节点一过，似乎就尘埃落定，过气翻篇。且说1949年，历史长河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大陆因天时、也因地利与人和，发生了重大转折，天翻地覆慨而慷，去年是这一时间节点的七十周年，今年已经翻开历史新的一页，却因为疫情肆虐，搅得小小寰球周天寒彻。在这样的百无聊赖忧心如焚中，看到了李伶伶的新著《南京1949》，粗看似乎给人以错了班车姗姗来迟之感，但细细读来，却真有一种好书不怕迟的相见恨晚后来居上之慨。

71年前中国大陆的历史风云、

开国大典，已经有汗牛充栋的各种文本、影视呈现，即使关于此年南京，也有多种读物、影像，长江路总统府的落日余晖，扬子江畔的炮声隆隆，渡江侦察记的栩栩如生，蒋介石一千人等在中山陵前哭丧着脸的眉头紧锁，百万雄师兵临城下达官贵人惶惶如丧家之犬的金陵残梦，这些都是多么令人熟悉的画面或桥段啊。李白登临黄鹤楼，面对同行崔颢捷足先登掷笔长叹，如此似乎给人以耳熟能详近乎俗烂的题材，李伶伶还能推陈出新，写出新意？但李伶伶就是有这样的胆气与豪气，她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，磨刀不误砍柴工，成就出了这样一部《南京1949》，可以说，较之同类文本，不仅毫无愧色，而且有后来居上的咄咄逼人，身手不凡。

这是一部聚焦南京、条理分明、鸟瞰全局的沉实之作。南京是十朝古都，美尽东南。她见识了太多的历史浩劫沧桑巨变，也见惯了太多的城头变幻血雨腥风。但1949年的南京，置放在这座城市的数千年历史上，该如何审视怎样盘点？是小处着眼管窥蠡测？是宏大叙事挂一漏万？作者通过这样的历史横断面，抓住了国民政府上层的元旦文告、总统下野、桂系粉墨登场，但蒋李仍旧彼此角力、府院依旧缠斗不

风雨苍黄看金陵

——《南京1949》读札

雷雨

休、国共或桌面上你来我往暗地里却动作频频，抓住了黄金抢运、文物迁移、教授站队分化、公职人员疏散选择、底层民众的茫然无措、大厦将倾前的世相百态、仓皇辞庙时的故作镇定，真是从容道来，不枝不蔓，沉静扎实，底气十足。

这是一部取舍得当、张弛有度、细节丰盈的耐心著作。时至今日，关于南京在1949年的诸多文献资料，当是报刊的相关报道，不少当事人的事后回忆，有关方面组织班子编写的各种读物，实在是丰富而芜杂，众多而繁复。有的自我贴金张大其词，有的囿于一隅强词夺理，有的为尊者讳故意把水搅混，有的近乎虚构说故事破绽百出。凡此种种，李伶伶搜求爬梳，精心比对，反复参酌，最终形成自己的判断，如关于司徒雷登，如关于当年南京地下党组织的活动，如关于南京有关民主党派的活动，要真正把这些东西都梳理清楚说得明白，的确不容易呢。陈修良的丰富经历，她与沙家兄弟的关系，当时南京军警系统内的复杂错综，策动起义的多头组织，南京市政当局人物的诸多表现，甚至不少人物当年在南京的详细住址，潜伏特务荆有麟等人的垂死挣扎，都不简单化，也不脸谱化，更不妖魔化，而是耐心呈现，娓娓道来，春秋褒贬，不是

赤裸裸，更不是急吼吼。这样的功夫，这样的耐心，真是很难能而可贵了，在人心浮躁热衷于短期变现急功近利的当下。

这是一部持之有故、不卑不亢、彰显史家思维的大气之作。重大历史事件，切忌人云亦云以讹传讹，也忌讳相沿成习不动脑筋沿袭旧说。如此重大历史巨变，实际上当时的许多人身在其中，并没有很真切地对自己未来命运的判断与把握。李伶伶展开叙述，力求避免主观臆断，也力求做到对任何一方都不卑不亢，她依据的资料、文献，都一一罗列做注，尽最大可能避免来源单一，畸轻畸重。黄金抢运，文物渡海，教授南下，涉及到的人物多多，李伶伶对于这些当事人，几乎不做廉价的大是大非面前的价值评判。南京解放前夕，短暂存在的维护社会治安的维持会，用于沟通衔接新旧政权，这样的史实，以前多被遮蔽，或者大而化之。这一短暂历史空隙的新币种、新报刊、新课程，还有“外来党”与“本地党”的敏感而具体的问题，李伶伶都以史家的眼光予以裁量，登高望远，小心求证，提出己说。

《南京1949》是李伶伶在写作出版了近十本书之后的颇显整合功夫、思考功夫、表现功夫的最新高度之作，非急就章，显大气魄，真是关于南京这座城市书写的一大收获。

丰子恺书屋

鲍安顺

丰子恺的文章中说他父亲中了举人之后，科举就废了，在家无事便每天吃酒、看书。他父亲晚酌时，八仙桌上的一盏洋油灯，一把紫砂酒壶，一只盛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，一把水烟筒，一本书，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……这种景致让人联想到一个落魄文人无奈的书意人生，丰子恺也许正是在这弥漫书香气息的屋子里熏陶长大。

丰子恺七岁时入私塾，先读《三字经》，后来又续《千家诗》，教他的先生就是他自己的父亲，丰子恺也是在自己家里的大书屋里开始上学读书的。1926年8月，弘一法师云游至沪，为丰子恺题“缘缘堂”横额，直到1933年，丰子恺才正式在家乡石门湾落成了缘缘堂，这是第一个真正属于他的书屋，书屋中铺设地板，四壁陈列数千卷图书，卧室中另藏有图书数千卷，佛堂中则收藏不少经书。五年后，此书屋毁于日寇战火，所藏书几乎俱失。1941年，丰子恺客居贵州遵义南坛，取苏轼词中“时见疏星渡河汉”之意，以“星汉楼”命名自己的居室——在国破家亡的日子里，他仍然在这儿坚持读书，丰子恺内心充满悲愤，也看见了星汉灿烂的希望。

1943年，丰子恺在重庆沙坪坝正街以西庙湾，自造“沙坪小屋”以寓以读，心灵得到短暂的小憩。1954年9月，丰子恺定居上海陕西南路，他以阳台天窗可兼采日月之光，命名所居书房为“日月楼”，并在此终老。

抗战胜利后，丰子恺离开沙坪坝小屋，他写过一篇文章说到屋子太简陋了，篱笆之内，地皮二十方丈，屋所占的只六方丈。三年以来，丰子恺坐卧写作，只能在一方丈之内。丰子恺说，屋墙是竹制的，单薄得很，夏天九点钟以后，东墙上炙手可热，室内好比开翻了的热水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丰子恺读书、作画之余，在院子里种豆、种菜、养鸽、养鹅……他在凄风苦雨之日，手酸意倦之时，推窗看见雪白的鹅，好像看见一个武装的守卫，感觉到小屋有了保障，一切有了生气。

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把丰子恺称为“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”。其实他的读书生活也是一种艺术化的生活，他在丰富藏书营造艺术化生活氛围中，几乎是被书籍所包围，坐拥书城，他们的精神家园就是书的世界。无论读书籍还是

读诗词，都成了他“床中伴侣兼旅中伴侣”。这正如鲁迅所说的“嗜好的读书”，“出于自愿，全不勉强”。

丰子恺是个京剧迷，更喜欢在书屋里听京剧。1933年，他父亲买了一架唱机，他听了张梅兰芳的唱片，便渐渐地听出了京剧的滋味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丰子恺在沙坪坝小屋里，又买了一架唱机。在当时的重庆买不到新唱片，丰子恺到旧货商店淘旧唱片，在小屋里放唱起来，便有了心情的愉悦和精神的振奋。

丰子恺曾经在南窗下的书桌旁“初冬浴日”，他的人生感悟可谓精彩——当他掩卷冥想时，发现屋内有了奇妙变化，夏日可畏的变成了冬日可爱的，夏日可爱的却变成了冬日可畏的。比如房间在夏天嫌其太小，可是初冬就忽然显得大了起来，天气变冷了便要用屏帏把屋子隔得更小了。又如热水壶，以前放在拐角里，现在可以像纪念碑似的矗立在眼前了。棉被在伏日看，嫌它既笨且厚，现在铺在床里使人悦目而且样子也单薄起来了……也有东西变坏了：像风，夏天快哉，天凉了却像防贼一样严防它进入室了。又如竹榻，夏日为众人所需至

宝，可是初冬却无人问津了。

丰子恺有一漫幅漫画：一个人、一座房子、一条船，坐落在俨然世外桃源的山水之中，另外还有一行小诗点出主题：“天涯静处无征战，兵气销为日月光。”朱自清曾这样评价丰子恺的画：“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，老咂着那味儿。”丰子恺大师的人生如此，艺术境界如此，他一生读书的小屋是如此。



图片来自网络